

【国际关系】

【原刊编者按】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与理论价值

徐秀军

【关键词】“全球南方”;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全球气候治理;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北京100732)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2024.2.4~9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项目号:2022GZZH01)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全球南方”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引发了人们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考。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学者开始使用“全球南方”,并用它来指称发达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群体。尽管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接受和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国际社会并未就“全球南方”所包括的国家

范围形成共识。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全球南方”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代名词,或者认为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广为使用的“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表述中,“南方”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质疑,并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取代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认识不仅普遍,也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正在赋予这一概念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等相关概念的独特价值,并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政治“再崛起”与“全球南方”热潮兴起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以外的“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诉求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阶段,“全球南方”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政治独立。尽管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主权国家概念,

但对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真正走上国家独立道路并拥有国家主权却是20世纪后的事。20世纪初,英、法、俄、德、美等国在整个世界建立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成了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对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逐步成为越来越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际诉求。在此阶段,“全球南方”被赋予了反殖民统治的政治色彩,^①“全球南方”也因此被用来指代有政治诉求的“第三世界”国家。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举行的万隆会议将保卫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作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后发国家的独立历程成为“全球南方”反霸、反西方传统形成的渊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余年间,绝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经摆脱了殖民控制,并成为“全球南方”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越来越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全球南方”进入了优先谋求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发展经济成为国家政策的优先选项,南南合作也日益聚焦经济贸易发展和技术合作。1978年,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在阿根廷举行,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更加全面的南南合作。1982年,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首次南南合作会议,探讨了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逐步取代政治独立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政策的优先议题,这一阶段的“全球南方”概念也在很多场合被具有经济属性的“发展中国家”所取代。冷战结束后,除了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东欧地区出现了一批转型经济体,并逐步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得益于经济上的长期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总之,在这一阶段,“全球南方”成为经济属性很强的概念,其在总体上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同发达国家经济的“双速增长”格局正式确立,由此开启了“全球南方”经济的赶超进程。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程有所加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发达国家GDP总额,2022年前者约为后者的1.4倍,前者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也达到后者的73.6%。^②

近年来,由于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南方”也随之进入谋求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新阶段,这一诉求在乌克兰危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乌克兰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再盲目追随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谋求政治自主,在全球问题上更加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南方”谋求独立自主的立场与行动,意味着“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崛起”,并由此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全球南方”的讨论热潮。同时,在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和重要依托力量。为此,“全球南方”受到广泛关注,并日益超越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

二、“全球南方”概念的多元内涵

在国际上,与“全球南方”相关的国家分类总体上有三种:一是根据经济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便是按照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来划分的。世界银行按照各国人均收入的不同将世界各国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四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人均国民收入、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等指标编制了人类发展指数,并以此为标准将世界各国分为人类发展程度很高、高、中等、低的四类国家。在这些分类中,经济指标在其中占据全部或重要分量。二是根据政治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划分的“三个世界”。其中,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处于中间的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除了这些国家、地区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划分清晰地展现了世界各国的政

治地位。三是根据地理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按照在地球上大体上所处的地理位置,一些国家分别被称为东方国家或西方国家、南方国家或北方国家。冷战时期,苏美两大阵营主要分处东半球和西半球,因而东方和西方国家这一地理属性的划分被引申为意识形态意义,分别用来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靠南的部分,发达国家主要处于北半球北部,南方和北方国家常常分别被用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名词。

从本义来看,“全球南方”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但是,从这一概念提出和演进的过程来看,“全球南方”与南半球并不严格的对应关系早已变得无关紧要,人们甚至完全脱离地理意义来使用这一概念。正因如此,当前“全球南方”概念总体上呈现如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模糊性。“全球南方”这一源于地理因素的概念,从一开始并未提供明确的地理界限。并且,“全球南方”不是一个成员构成明确的国家群体,这一群体中包含了多元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甚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无法准确描述这个世界。^③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模糊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是一个可随意被界定的概念,国际社会对绝大多数国家是否属于“全球南方”仍有基本的共识。二是可塑性。一方面,“全球南方”内涵是动态发展的。从地理上的南方到跨地域、跨领域的融合,从关注经济发展到经济、政治的融合,从外生的界定到外部和内部塑造的融合,“全球南方”的概念不断发展和丰富。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国家所处的发展身份、水平和阶段不断变动,“全球南方”所涵盖的国家成员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南方”的发展演进可能出现三种情景:第一种是维持群体的多元性和松散性,并在舆论和道义上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第二种是形成一种国际运动,在特定的功能议题上发挥作用;第三种是形成机制化的合作组织。目前,“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日益增大的运动力量,部分国家群体组建的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扩大在

“全球南方”的影响。三是竞争性。当前,在“全球南方”的概念范畴上,一些国家的话语权争夺态势凸显。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争夺“全球南方”概念的话语权,并试图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利益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从而使“全球南方”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工具。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明确宣称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④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大国积极谋求“全球南方”的领导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竞争。

作为研究对象,“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在现阶段突出体现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三个维度。在地缘经济内涵上,“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强烈发展诉求的群体,“求发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话语。“全球南方”崛起的基础源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未来“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依然要靠持续的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对话,发展问题始终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议题。在地缘政治内涵上,“全球南方”不包含作为发达国家群体的西方国家,并且它还是一只拥有反西方传统的政治力量。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在政治立场上不盲从西方的倾向更加明显。在一些西方大国推出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时,数十个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上明确拒绝加入对俄制裁阵营。2023年8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上,尽管西方国家极力争取“全球南方”,但很多国家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⑤在国际关系上,“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相同身份认知的群体,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共同的利益和行为。当前,“全球南方”热潮的兴起正在强化这一国家群体的自身认同和国际认同,并为国家间的交往与博弈不断奠定新的基础。并且,“全球南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使国际关系经历深刻变革。^⑥世界格局的发展演进也将因“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更加深刻的调整和变革。^⑦

三、“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论价值

尽管学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关注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并未受到足够的

重视。相比以往,得益于自身的长期发展以及当前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引发着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全球南方”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思考。

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广泛关注将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思维广度。具体来说,研究思维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从大国视角进一步拓展到小国视角。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小国的作用长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使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往往围绕大国行为和利益。作为一个小国密集的群体,“全球南方”使一大批国际关系中的“弱权力”汇聚到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认识和理解小国内部互动与对外协调的实践。二是推动国际行为主体的认知从实体行为体拓展到非实体行为体。长期以来,国际行为主体常被界定为参与国际事务并能产生影响的实体。它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但是,截至目前,“全球南方”并非国际组织,也不是有明确成员的国家群体,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作用的非实体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重视这种非实体力量的作用,并在理论上给其一席之地。三是推动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从利益政治拓展到身份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利益往往是理解国家行为的最核心要素。还有学者指出,身份是利益的前提,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⑧在利益与身份问题上,“全球南方”基于共同身份争取国际话语权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大国有选择性地塑造他国是或非“全球南方”身份来维护自身利益。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身份的塑造意味着身份还可以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凸显了国家行为的身份政治逻辑,这将进一步丰富国家行为逻辑的理解。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广泛关注将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思路。这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概念与范畴。除了“全球南方”概念本身,“全球南方”的崛起可以使人们对已有概念、范畴和表述产生新的阐释和理解,同

时创造性地提出相关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以此引领学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繁荣与理论进步。二是现象与问题。作为一种动态变化的国际现象,“全球南方”的崛起催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未提供足够的关注和有力的解释。“全球南方”正在改变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对基于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⑨如何从“全球南方”的行为实践中提炼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是摆在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三是理念与价值。作为一种国家类别划分,“全球南方”概念淡化了单一的政治属性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摒弃了单一的经济属性上的等次划分,相对其他的国家类别划分具有更为中性、更为多元、更为综合的内涵。无论是“全球南方”的概念,还是“全球南方”的诉求和行为,都承载了独特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将为主要关注大国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注释:

①门洪华、俞燕芳:《“全球南方”框架下的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观察》2024年第1期。

②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 Washington, DC: IMF, 2023.

③Joseph S. Nye, Jr.,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November 1, 2023, <https://www1.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outh-is-a-misleading-term-by-joseph-s-nye-2023-11>.

④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⑤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0-59页。

⑥杨宝荣:《从“全球南方”看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新特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60-69页。

⑦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4-78页。

⑧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9.

⑨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79-90页。

“全球南方”视角下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重构

王友明

【作者简介】王友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5)。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2024.2.10~16

当下,沉寂多年的学术概念“全球南方”成为热词,随着该概念向政策层面的转化和应用,国内外政学界对其如何界定争议不断。尽管可以在各种定义的模糊性、多样性和笼统性中看出较多分歧和差异,但这一概念已超越地理和经济范畴,其内涵和外延具有广谱性,学界对此有一定的共识。囿于政治底色、经济发展使命、国际利益诉求等共因,“全球南方”的认同度和覆盖面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概念,身份认同有争议的阿根廷、土耳其等国也被纳入了全球南方国家范畴。经济层面上,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彼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全球南方”可以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合体。政治层面上,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也不是与西方对抗的集合体,但全球南方国家均非西方世界成员也是客观事实,或者说,事实上它们均非美西方盟友体系的核心成员。国际地位层面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属性基本相同或相似,它们均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其国际境遇和国际利益诉求大致相同。在当前国际秩序发生系统性震荡之际,“全球南方”的热度背后有着大国博弈的政治考量,该概念运用得当与否对未来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国际秩序的重构有着重要影响。

一、“全球南方”视角下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

进入21世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入变乱交织和加速演变的新周期,各种传统挑战和非传统挑战叠加发酵,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与美西方国家当前国际秩序的认知和推进方向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愿景。

第一,在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看来,当下国际秩序“失效、失衡”的态势愈发凸显。当前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的制度设计主要是由美西方主导完成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分别作为该体系中全球政治治理、经贸治理和金融治理的代表性权威组织,在战后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并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贸发展,快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这种由西方垄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弊端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失衡性,即新兴国家和发展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代表性与其经济体量不相称,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上层建筑权力分配架构并未随着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改变,二者之间的失衡面不断扩大导致全球治理各体系的运转出现了脱节甚至停滞,尤其美西方把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和世贸组织的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全球经济复苏活动。二是失效性,即战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机构未能有效地解决当前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美西方挑动并介入的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其把持的国际机构解决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日渐式微且趋于失效状态,西方强权和霸权治理模式与原本应按联合国宪章和宗旨治理的理想模式相距较大,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在内的全球治理机构亟待改革以增强其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有效性、时效性和公平性。

第二,在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看来,当下国际体系出现新的“两个平行体系”态势在抬升。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一改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收缩政策,重拾盟友体系以构建西方继续统治全球的国际新秩序。由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心中已“脑死亡”的北约组织满血复活,一度寂然无为的七国集团随之风生水起,新机制“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应声而出。在此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新特点是,美西方的盟友范畴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国家和法德日等发达工业国,美国力图将诸如印度等新兴国家也纳入新盟友体系。由此,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等一系列新机制梯次性成立。当下,美主导打造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全要素的新旧盟友合作机制在全球铺开,形成以意识形态价值观为原

则,以西方规制为基础,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封闭性、排他性、对抗性的国际新体系。显然,这一体系的构建意在以“小院高墙”的治理范式来对抗后来者动其“国际权力奶酪”。

与此同时,一种与西方盟友体系截然不同的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且日益做大做强,它们是以“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全新合作机制。其新意主要在于,一是这些合作机制的参与方和实施方均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主,它们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合作互补、联动自强的多边机制。二是这些合作机制的角色定位和合作宗旨开宗明义,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上合新安全观”,不针对任何国家和集团且不搞阵营对抗和“两军对垒”。三是这些合作机制突破了狭隘的经济合作框架而扩展至政治、安全、人文等领域,进而发展成为综合性、立体性合作机制。四是这些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成果显著,各类合作已形成常态化、平台化、系统化的局面,并成立了诸如新开发银行等实体机构,打破了多边合作机制往往沦为“空谈俱乐部”的魔咒。五是这些合作机制规模大、规格高,感召力强,已形成广泛的国际效应,尤其是多达四十多个国家排队希望加入金砖机制,这是国际多边机制发展史上较为罕见的现象。

全球南方国家争相加入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与美西方热衷在全球构建各类盟友体系形成对比效应,两种态势和两种力量似乎再次将全球割裂为二,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是否再次陷入两个平行体系对抗”的担忧,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何去何从正处于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在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看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虽未完全“失灵”但并非唯一选择,“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已被打破。从全球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之争往往归结于发展模式之争。在模式之争中,哪种发展模式得到充分认可,其倡导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体系观就会占据上风。在现代化过程中,囿于美国现代工业化的巨大成功以及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最终胜出,美国发展模式曾风靡一时,美国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

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代化的标配模式,甚至形成了“全球化=美国化、现代化=西方化”的惯性思维。西方学者福山曾宣布美国现代化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模式,认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成为最佳和最理想的国际秩序,由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垄断国际事务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因而,“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治理全球”,这也是为何美国自视独一无二而奉行“例外主义”的主因。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实践,尤其是在美国所谓“后院”拉美地区的推行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梦魇。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但未能使拉美摆脱久拖未决的经济困境,反而让拉美国家付出了两极分化的惨痛代价。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带来的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瞩目成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和持续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至少有三点在国际政界和学界产生了震撼性效应。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并未采取西方殖民掠夺的扩张路径,而是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解决了上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脱贫问题,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为罕见。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痼疾提供了新答案。中国“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思想不但在经济学理论上开创了新体系,也在实践上走出了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与凯恩斯主义“大政府、小市场”之间循环往复的怪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级化的国际秩序观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充分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也受到广泛欢迎,有的理念已写入联合国文件,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得到了大多全球南方国家认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实践代表了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正确方向。

二、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秩序重构的路径选择和基本主张

国际秩序的走向和路径选择事关人类社会发

的前途和命运,目前国际社会正面临两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选择,一种是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对此,拜登直言不讳地公开声称,世界将有一个新秩序,美国必须领导它。另一种主张是各国平等治理下的国际秩序,即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此,大多全球南方国家倾向于后一种选择。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不甘继续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边缘角色,主张国际权力体系再重组、再分配,实现国际体系由“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转变。纵观近现代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转圜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由海洋秩序体系向大陆秩序体系转换,还是从大西洋中心体系向太平洋中心体系的转变,霸权国家无一自动、自愿地让渡其既得权益而退出国际舞台中心,相反,它们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竭力阻碍权力体系的改革和变更,力图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维系其国际事务的垄断权。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和联动合作不断增强,美西方无法坐视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做大做强,更无法容忍后来者动其权力蛋糕。对于新兴力量意欲改变既有国际权力架构的“咄咄”态势,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初“商业圆桌会议”演讲中声称,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每三代或四代发生一次的拐点,其结果将由美国决定”。

然而,饱受美西方垄断国际事务两个多世纪而吞下种种苦果的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容忍在新世纪国际权力架构中继续被边缘化的境遇,它们主张实现国际体系由“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转变。在新兴国家的带动下,它们抱团取暖,联动发出“国际权力体系再平衡、建立公正合理新秩序”的全球南方之声。对此,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二十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演讲中称:“西方想要建立垄断国际体系的企图注定失败,因为世界极为复杂多样,以至于无法服从某一种方式。事实上,我们面临

建设新世界的任务。”^②在2023年9月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的开幕式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此前北方国家一直按照其自身利益来组织世界,现在应该由南方国家来改变游戏规则。”^③印度外长苏杰生在阐述金砖机制的使命时明确表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受制于极少数国家,而金砖国家正是一股旨在平衡世界的强大力量。”^④印度外长这种表态解释了印度面对美西方的诱拉和分化拒绝退出金砖机制的原因。印度深知,尽管美西方邀其加入各种政治经济安全的小圈子,自己并非与西方平起平坐的主角,仍然是西方眼中的“非我族类”,是为其所用的配角。印度若想获得与其经济体量相称的大国地位和国际权力,唯有依靠与全球南方国家抱团取暖而非西方的诱惑和施舍。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应有国际事务话语权、实现国际权力体系重组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金砖国家联手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份额改革的成就具有较强示范效应。在此轮改革中,近6%的份额向新兴国家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的代表性和份额均有所提升并进入前十名。然而,这一成就距离全球南方国家应有的国际权力地位还相距甚远,远未达到国际权力体系再平衡的目标。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应聚焦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一轮份额改革,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力争改变美西方在其中的霸权和垄断地位。

第二,大多全球南方国家不愿看到世界产生新的两个平行对抗体系。尽管全球南方国家联动抗争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但它们还是不愿看到世界两个阵营对抗的平行体系死灰复燃。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体系殷鉴不远,这一体系带给世界的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幸福,而是意识形态仇视、军备竞赛、冷热战频发、经济割裂,全球南方国家不愿看到当前国际体系重蹈覆辙。它们深知,卷入大国争夺和阵营对抗对于自身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们更从当前地缘冲突中看到,在大国博弈和对抗中,选边站队也许得到权宜之利,但终将吞下恶果。因此,全球南方国家深深体会到卷入集团对抗带来的危害,更明确了自身利益系

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的认知。

因此,全球南方国家争相加入的金砖机制从成立伊始就昭示国际社会,其角色定位并非致力于与西方世界对抗而争霸全球。金砖机制并非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推翻者而是推动者,是一支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公正、公平、合理、均衡的新兴力量。金砖国家无意另起炉灶,其宗旨是要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世界平等共治、合作共赢。为此,金砖成员国都表明金砖机制无意染上阵营对抗的政治色彩,也无意贴上平行对抗体系的标签。印度、巴西等国高官多次公开表态,如果金砖机制嵌入与西方二元对抗的政治和军事元素,二者宁愿选择退出该机制。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这种不站队、不取代、不对抗的开放合作的角色定位使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日增,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加入其中,在整体利益突破中实现自身利益。

三、全球南方国家重构国际秩序的制约因素

重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并非朝夕之功,而是充斥合作与竞争、抗争与妥协的漫长进程,其变革的烈度和强度、复杂性和突发性也将前所未有。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其利益整合的难度和外部势力的拉拢和分化是无法回避的两大掣肘因素。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整合难度大。“全球南方”覆盖面庞杂而多元,其成员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差异,彼此的现实利益需求和国际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它们在重构国际秩序进程中并非铁板一块。一些国家基于自身的民族利益锱铢必较,并不总能与其他南方国家形成利益与共的整体力量。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担心自己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而不愿意卷入大国对抗与纷争,但是它们又希望看到大国在本地区展开竞争,如果一方大国向它们施压,它们就会打另一方大国牌,以左右逢源的手段拓展战略回旋余地。有些国家甚至在大国对抗和竞争中坐地起价,从而在大国竞争与对抗中获益最大化。

第二,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难抵美西方的拉拢与分化。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和战略自主性联动,美国愈发担心另一种国际体系将其取而代之。美国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夯实既有盟友体系以维系

全球霸权,另一方面,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南方”各个角落。为拉拢南太平洋岛国,美国连续两年召开“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布林肯也成为40年来首位访问所罗门的美国国务卿。非洲国家不再是特朗普眼中的“粪坑国家”,而是拜登政府的公关对象。为此,拜登政府出台了“新撒哈拉以南对非战略文件”,以此承诺加大对非洲的帮扶力度。面对所谓“后院”拉美,拜登出席美洲峰会并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并为此召开峰会。凡此种种动作,无一不彰显美国正在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入和关注。面对诱惑和拉拢,一些南方国家为了眼前利益,最终选择倒向美西方体系,在美国“以小博大”的大国竞争策略中充当棋子甚至为美火中取栗。即使像阿根廷这样的G20成员,米莱新政权也义无反顾地投入美国怀抱。

概而言之,“全球南方”是当代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国际力量对比南北截然二分的结果,只要南北差距尚存,该概念就有存在的合理性而非伪命题。同理,该概念成为热点也是当今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结构失衡的结果,只要这种失衡导致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持续下去,“全球南方”就会超越经济范畴,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集体存在并联动抗争应有的、与其体量相称的国际权益。当然,这一概念的再度兴起不乏大国背后政治操弄的因素,是美西方拉拢和分化全球南方国家从而边缘化中国的手段之一,其中也暗含为了遏制中俄而助推印度高擎“民主政治”大旗成为“全球南方”领头羊之意,其根本目的在于热炒“全球南方”并在其中实现“去中国化”。对此,中国政学界及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动向,相对“全球治理”这一同样源于西方的概念,中国在政策层面用较短的时间接纳了“全球南方”概念并对其进行精确和有说服力的解读和阐述,即“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⑤为此,中国将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把发展作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心任务,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范式,推动建立契合时代特征、反映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新体系。

注释:

①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② "President of Russia,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Meeting," October 5, 202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

③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uba," MoFA of Cuba, September 15, 2023, <https://cubaminrex.cu/en/speech-president-republic-cuba-miguel-diaz-canel-bermudez-inaugural-session-summit-heads-state-and>.

④ United Nations, "More Than just a Few Countries Should Set the Agenda, Indian Minister Says at UN," September 26, 2023,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3/09/1141482>.

⑤《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26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zbhd/202307/t20230726_11117824.shtml。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全球南方”

李 强

【作者简介】李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天津 300204)。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2024.2.17~21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南方”泛指在地域上涵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等广大地区,在经济上追求发展振兴,在政治上奉行独立自主,在全球治理中追崇公道正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特定语境下,“全球南方”的外延与发展中国家基本一致,在内涵上则体现出成员国家温室气体历史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低,气候敏感性和脆弱性强,既面临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又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等一系列共同特征。

一、“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

“全球南方”主张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能否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关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能否全力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以来无限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所致,因此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领域,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必须体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切,才能彰显气候公平与正义,充分调动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意愿。习近平主席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减排问题上作出表率,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关切,落实气候融资承诺,并在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①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减排行动,提升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关注与资金支持,兑现气候援助资金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帮助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懈斗争下,这些正义要求最终得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中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呈现。

“全球南方”主张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对能源和土地不平等且不可持续的使用,明确导致了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并增大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度和烈度,从而致使全球各个地区陷于危险之中。”^②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任何国家都有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共同责任”,但同时也要考虑各国在发展程度、历史排放、人均排放等方面的差异,确定“有区别的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无论历史上还是目前,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自发达国家。从历史排放来看,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20%,但其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占到全球累计排放总量的75%。从现实排放来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非OECD国家的2.35倍,而G7集团国家更是高达2.9倍。^③因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要求,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合理碳排放空间的根本权益。

“全球南方”主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四大赤字贡献的中国智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能平等参与协商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都能平等参与共同制定制度规则,都能平等共享全球气候治理成果。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全球气候谈判从本质上讲是各国围绕温室气体减排而谋求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气候协议的复杂博弈,争取碳排放空间实际上就是争取未来经济发展空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就是寻找各国气候利益的交叉点,形成全球气候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要关注发达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要求,也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更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二、“全球南方”面临的共同挑战

“全球南方”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亟待提升。“全球南方”崛起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赢得更多话语权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但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格局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从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权力生成与作用发挥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制度性话语权、科技性话语权和道义性话语权三个维度。在制度性话语权维度,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议题选择等方面普遍存在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统筹协调能力不强、理念创新能力不够等共同问题,无法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获得优势,难以对全球气候谈判施加实质性影响。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南方”普遍关注的问题,但直到2006年“适应基金”才写入“内罗毕工作计划”,且迄今未能落实到位。在科技性话语权维度,拥有科技性话语权的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可以借其优势推动形成符合自己气候利益的气候协议及实施细则,在减排份额计算、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应用推广、气候融资模式、全球气候盘点等核心领域占据有利地位。绝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尚未构建起

完备的气候科学体系,在气候科技转让方面也没有获得发达国家的实质性支持。在道义性话语权维度,尽管某些太平洋岛国因生存危机获得了特殊的道义性话语权,但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迅速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经常面临发达国家借道义之名指责其碳中和时间偏晚、碳达峰数值偏高、不接受对等减排、不提供气候援助资金的困境。

“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阵营分裂的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治理开始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立”曾长期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全球南方”以“77国集团和中国”模式与发达国家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努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断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发生阵营分化,以“南北对立”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正在向多气候集团共存格局演变。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博弈情景复杂:以南北博弈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分野依然存在,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三大板块各自演化,五大类别国家逐渐清晰。^⑤两大阵营、三大板块、五类经济体的总体格局改变了此前身份决定立场的特征,逐渐演变为气候议题与具体利益决定立场。在传统气候议题(如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强制减排、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不断细化、新议题(如损失和损害基金、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全球盘点、适应基金等)不断出现的影响下,这种转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三、“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必须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球南方”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决捍卫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主赛道地位,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基本原则及各项规定,以此为基础不断凝聚全球共识,汇聚全球合力,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全球南方”要积

极推动和构建各种区域性、专业性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早已超出环境科学领域并渗透到事关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及层面,谋求建立单一的整体性气候机制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如果符合特定标准,构建气候机制复合体将会优于政治上可行的整体性机制。^⑥“全球南方”要坚决警惕、抵制发达国家借多边主义之名行伪多边主义之实的图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构建小多边机制,拉拢其他发达国家构建气候联盟,联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新兴经济体施压。2022年12月,七国集团(G7)峰会成立国际气候俱乐部,联手构建“碳关税同盟”,意图以“碳关税”为工具手段限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势头。

“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必须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全球南方国家总数多达150多个,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0%,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2.2%。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政治新兴力量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已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⑦在全球气候谈判领域,全球南方国家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加。^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生态脆弱性较高,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也面临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难题,因此对国际气候秩序有着相似的立场和看法。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因自然禀赋和发展程度差异而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形成共同立场并维护共同的发展权益。近来,发达国家炒作“全球南方”概念,就是想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切割,意图离间全球南方国家间关系、分化“全球南方”阵营、削弱“全球南方”整体性力量,以实现其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目的。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成员,中国应该以“77国集团和中国”的合作模式引领“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共同立场塑造集体话语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必须加强南南合作。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共有的政治底色,发展

振兴是“全球南方”共同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秉持的共同主张。基于相似的历史境遇、发展需求以及对变革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政治主张,“全球南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具备天然基础。“全球南方”应强化“77国集团和中国”“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在机制建设、议程议题设置等方面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能,与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形成良性互动。“全球南方”应充分发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作用,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注重协调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球南方”应充分利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在2015年出资200亿元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帮助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与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兑现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承诺形成鲜明对比。截至2023年9月,中国已累计为气候南南合作安排资金超过12亿元,与39个全球南方国家签署47份气候南南合作文件。^⑨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82页。

②IPCC,"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 September 1, 2023, https://report.ipcc.ch/ar6syr/pdf/IPCC_AR6_SYR_SPM.pdf.

③贾玮:《格拉斯哥未兑现的气候正义,能否在埃及达成》,中国经济网,2022年11月4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2211/04/t20221104_38210650.shtml。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1页。

⑤五大类别国家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口增长较快的发达经济体、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人口趋稳或下降的发达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口趋稳的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代表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和以低收入为特征的欠发达经济体,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在京发布——落实〈巴黎协定〉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6/1108/c1002-28845440.html。

⑥ Robert O. Keohane, David G. 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9, No. 1, 2011, p. 7.

⑦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年第11期,第22-27页。

⑧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⑨《中国—巴基斯坦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援助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2023年9月25日, https://www.mee.gov.cn/ywdt/hjynews/202309/t20230925_1041845.shtml。

“全球南方”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主张

张杰

【作者简介】张杰,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西安 710128)。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2024.2.22~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21VGQ015)的阶段成果。

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提升至58.3%，“全球南方”正在实现经济的崛起。^①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不甘继续沦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规则体系为基础，提出一系列政治诉求。但是，“全球南方”的发展仍受不公正、不合理国际旧秩序的严重制约，加之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疤痕效应尚未褪去，地缘冲突热点频发，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鸿沟日益加大，“全球南方”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为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球南方”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愿拱手让出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位置，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逆全球化”政策，积极构建美墨加、美日印澳、美欧日、美韩等小多边体系，并试图将内部的经贸规则扩展至全球，牢牢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②“全球南方”深刻意识

到，必须加强团结并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积极提出立场主张和设置议程，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参与者，更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态度。

第一，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南方”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改革与国际合作应对挑战，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承载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中拥有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在2023年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上，与会国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代表性，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改革。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参会代表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传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面对国际形势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的“逆全球化”政策，重构世界经济秩序。^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相继提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旨在重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进一步运用“制裁大棒”打压竞争对手，推行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仅拜登执政第一年就在全球范围新增了765项制裁。^④“全球南方”普遍反对这种片面强调自身利益优先以及“逆全球化”的倾向，谴责其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也是单边主义霸凌行径的实施者。玻利维亚、伊朗、津巴布韦等国领导人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实施单边制裁，严重阻碍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⑤《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约翰内斯堡宣言》对采取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显著负面影响的单边强制措施表示关切。^⑥“全球南方”多个国家还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表达了严重关切，反对美国的歧视性补贴政策 and 利用“非市场导向政策”的行径，认为其违反WTO基本原则，严重扰乱国际贸易投资，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指出人为设立贸易壁垒、妨碍公平竞争的行径只会阻碍全球相

关产业发展。^⑦

第二,主张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另起炉灶”。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宗旨是确保国际自由贸易,通过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建立国际贸易框架,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提供稳定且可预测的贸易环境。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主张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坚持多边理念,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构建的广泛合作协调机制,希望保护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享有的权益,主张在关税减免、延长磋商期限、非关税壁垒等方面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与此同时,它们推进世贸组织维护所有国家主权平等、促进共同合作,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是普遍共识、大势所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⑧《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重申决心打造自由、开放、公开、非歧视、透明包容、可预期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和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同时应致力于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必要改革,增强其各项职能。^⑨2023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重申,应当“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为各方营造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⑩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世贸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推进贸易谈判、发展中国家定位、规则透明度等方面存在问题,^⑪希望推动世贸组织向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改革或者直接将其绕开。此举遭到了“全球南方”的强烈谴责,认为其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国际规则与秩序。埃及、印度和南非对美国向世贸组织施压、质疑其上诉机构权威,致使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瓦解的行为十分不满。三国共同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思考》的提案,旨在解决美国阻碍世贸组织顺利运作的问题。该提案指出,目前以美国为主导、在“非正式讨论”下讨论的主题未

能涉及全体成员关切的问题,特别是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⑫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部长明确表示:“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对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贸易至关重要。”^⑬

第三,主张构建广泛的合作机制,反对排他性国家俱乐部。“全球南方”主张构建广泛的合作协调机制,助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增长,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相继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推动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就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粮食与能源危机等问题进行广泛合作。近期的金砖“扩员”也备受瞩目,被视作“全球南方”的又一高光时刻。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旨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普遍繁荣。通过进一步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金砖+”机制日渐成为引领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南南合作的新典范。^⑭

“全球南方”秉持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反对阵营对抗,谴责美西方构建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小圈子”与“小集团”,认为发达国家沉迷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各种手段胁迫他国加入所谓的“民主同盟”,加剧了国际社会分裂,^⑮反对搞“筑墙设垒”和“脱钩断链”,批评七国集团打造排他性小圈子扰乱国际供应链稳定、危害全球经济的行径;^⑯指责美国等国对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朝鲜等国实施的单边强制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严重侵犯相关国家人民的人权。^⑰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反俄决议的投票结果为7票反对、32票弃权,130多个国家不参与对俄金融制裁。“全球南方”在重大问题上没有与美西方保持一致,^⑱这充分表明了“全球南方”主张合作协调、反对阵营对抗的立场。

总之,“全球南方”主张坚持多边理念,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主张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另起炉灶”,主张构建广泛的合作协调机制,反对阵营对抗。这些主张正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与认可,在

推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南方”的声音和行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April 11, 2023.

② 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3-24页。

③ 郝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深刻变革》,《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第85页。

④ Christopher Sabatini, "America's Love of Sanctions Will Be Its Downfall," Foreign Policy, July 24,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7/24/united-states-sanctions-debt-china-venezuela/>.

⑤《多国领导人在联大谴责美国霸权行径》,人民网,2022年9月26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926/c1002-32534162.html>。

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新华社,2023年8月25日, http://www.news.cn/2023-08/25/c_1129823229.htm。

⑦《商务部:美方歧视性补贴政策违反WTO基本原则》,中国新闻网,2023年12月7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3/12-07/10124264.shtml>。

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人民日报》2023年9月28日,第1版。

⑨《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摘要)》,《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9日,第4版。

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摘要)》,新华社,2023年9月10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173.htm。

⑪ 郝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深刻变革》,《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第86页。

⑫《埃及、印度和南非提交关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思考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3年12月12日,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312/20231203460226.shtml>。

⑬《强调发展目标,反对美国荒诞的WTO改革建议》,人民网,2019年7月28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728/c1002-31260094.html>。

⑭ 林宏宇、张行:《“金砖+”机制推动发展中国家新型南南

合作》,《学习时报》2023年8月30日,第1版。

⑮《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5月18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305/t120230518_11079585.shtml。

⑯《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会见俄罗斯驻日使馆临时代办奥维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2023年5月18日, http://jp.china-embassy.gov.cn/chn/dszlnew/202305/t120230518_11079370.htm。

⑰《联合国专家和各国学者普遍批评美国等实施的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新华社,2020年9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24/c_1126532773.htm。

⑱ 国合平:《警惕“全球南方”背后的地缘博弈阴影》,《光明日报》2023年4月2日,第8版。

南南合作与国际秩序的完善

江时学

【作者简介】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200444)。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2024.2.26~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项目号:18ZDA170)的阶段性成果。

曾于1969-1974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1980年发表了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的报告。^①该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区分两类国家的线被称作“勃兰特线”(Brandt Line)。从此以后,“南方”“北方”“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南北关系”以及“南南合作”等词汇不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文献和媒体中。顾名思义,南南合作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南南合作不仅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一、南南合作的发展进程

南南合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等领域开展的交流与合作。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开创了南南合作的新纪元。在这一重要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确定为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开展国与国之间合

作的十项原则,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为推动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础。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时指出:“在万隆精神激励下,亚非国家联合自强,区域、次区域、跨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②

最初的南南合作主要是在政治领域的合作。1961年9月成立的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开展合作和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平台。1964年6月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加强团结与合作的决心,表达了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强烈愿望,也推动了政治领域的南南合作。

应该指出的是,受冷战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不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是,经济领域中的南南合作似乎呈现出“雷声大而雨点小”的特点。^③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始提速。在这两个大背景下,尤其在2000年9月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后,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得到重视。200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UN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④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南南合作委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9月26日,中国与联合国共同举办了南南合作圆桌会。在这一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总结南南合作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并就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了以下建议:一要致力于探索多元发展道路。二要致力于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三要致力于实现务

实发展成效。四要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架构。^⑤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人员、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也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中加强南南合作的决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庆祝2020年“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时所说的:“当今世界充满着相互关联的挑战,南南合作在塑造更光明的未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南合作有力地提醒我们,只要各国团结一致,就能克服万难,加速可持续发展。”他还说:“从气候行动到消除贫困,从医疗保健到教育,从贸易到数字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可以为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铺平道路。”^⑥

2023年9月16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闭幕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发表的《哈瓦那宣言》指出,面对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与会代表还高度赞赏了长期以来中国为推动南南合作做出的巨大贡献。^⑦

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一种体现世界体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用国际法或权力规范国际关系的机制。国际关系是由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权力关系组成的,因此,国际秩序还可被细化为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如国际贸易秩序、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其他规范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此外,国际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崇尚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推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或主导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表面上,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似乎应该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一貌似公正的国际秩序却成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舞台

上为所欲为的“幌子”。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们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唯我独尊,在人权、主权和规则等领域经常使用“双重标准”,随意抛弃《联合国宪章》,肆意践踏多边主义。无怪乎“自由国际秩序”常被当作美国控制下的国际秩序或“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自由国际秩序”似乎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会陷入危机。^⑧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秩序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写道:“‘自由国际秩序’是在2019年开始崩溃的。”^⑨阿米塔·阿查亚认为,早在特朗普上台以前,“自由世界秩序”就已经出现了崩溃瓦解的趋势。^⑩2019年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年会开幕前夕发表的《2019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当前的国际事务表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危机不计其数,而且,‘自由国际秩序’正在瓦解。”^⑪

且不论“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瓦解或衰落,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始终希望改变以“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例如,早在1974年,邓小平就在联合国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⑫1990年,他又说:“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⑬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并不是固化的。尤其是过去的一二十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要求完善国际秩序,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一良好心愿顺应时代潮流,也体现了南方国家的愿望,但西方却因此而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⑭

其实,正如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2017年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世界并没有失序,二战之后

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依然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应当继续加以坚持和维护。”^⑮在2019年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⑯2021年7月2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指出:“中国是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受益者之一,我们不会另起炉灶,也无意另搞一套。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⑰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⑱

三、南南合作推动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推动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南南合作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国际社会的主体,因此,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应该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次,发展中国家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受害者,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秩序有时也会使其受益;再次,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和通力合作、同舟共济,以集体的力量推动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为了使南南合作助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近几年,美国及其盟友经常采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手法,在各个场合大谈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是,它们避而不谈规则的定义。事实上,它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其“规则观”体现的不

是多边主义和民主正义,而是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背道而驰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在国际上流传甚广,严重混淆了国际社会的视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追求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要异口同声地反对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旗帜鲜明地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承认遵从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第二,要重视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南南合作涉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及有关机构,在缺乏一个“全球政府”的条件下,联合国应该发挥积极的协调和组织作用。例如,要进一步做好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顶层设计,要更好地调动“南南银河”的主观能动性,要设立一种鼓励所有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的有效机制,要确定南南合作的优先领域,整合发展中大国在推动南南合作时使用的多种政策工具。

第三,要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倾向各异,与西方的关系也有亲疏之分,因此,它们对国际秩序的诉求必然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为了最大程度地用一个声音说话,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这种沟通和协调既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进行,也可以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舞台上开展,甚至还可以在不同规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内做到。

第四,要防范西方挑拨离间。“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否定,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会甘拜下风,更不可能认输。它们不仅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鼓吹其“规则观”,而且还经常在发展中国家中挑拨离间,破坏南南合作。尤其那些右翼掌权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被“青睐”。

第五,要将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整合成一个新的合作机制。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现有130多个成员;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现有120个成员。这两个组织囊括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

文化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组织的合作机制应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调整。例如,除了继续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首脑会议、外交部部长会议及部长级会议以外,还应成立一些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某些重大问题的工作组或专家组,尽可能地避免清淡。更为重要的是,在条件成熟时,有必要设立一种联席会议的机制,将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整合成一个新的合作机制。

第六,要促使发达国家为南南合作提供正能量。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动。为使南北合作助推南南合作,发达国家应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牢记同舟共济的观念,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南南合作。例如,发展中大国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时,发达国家不应持有嫉妒的心态,而应该利用自身的特长,最大限度地开展三方合作。发达国家的媒体和学术界也应该放下“有色眼镜”,为发展中大国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出正面评价。

四、结束语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等领域开展的交流与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南南合作既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能为推动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的参与者。除了力所能及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以外,中国还大力支持联合国开展南南合作。中国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但中国反对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上应该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为了使南南合作助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重视和发

挥联合国的作用,要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要防范西方挑拨离间,要将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整合成一个新的合作机制,要促使发达国家为南南合作提供正能量。

注释:

① Willy Brandt, *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 MIT Press, 1980.

② 《习近平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第2版。

③ 保罗·德雷齐奥、左莱克·赛菲特认为,那一时期南南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南南合作的政策、制度安排以及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参见 Paolo de Renzio and Jurek Seifer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apping Actors and Op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 10, 2014; 布拉尼斯拉夫·戈索维奇认为,当时南南合作面临的难题是缺乏一个由某一国家(或多个国家)引领的“火车头”,参见 Branislav Gosovic, "The Resurgenc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 4, 2016。

④ 2011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从2012年起将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改为每年的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9月1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⑤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第1版。

⑥ "Nations of the South Display Spirit of 'Global Solidarity'—UN Chief," September 12, 2020,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9/1072082>.

⑦ 朱婉君:《哈瓦那峰会发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强音》,新华网,2023年9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3-09/>

17/c_1129868342.htm。

⑧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0-59页。

⑨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019.

⑩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⑪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9,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9/>.

⑫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

⑬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⑭ Yusof Ishak Institute, "China as a Selective Revisionist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erspective*, No. 21, 2019; Oliver Turner and Nicola Nymalm, "Morality and Progress: IR Narra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visionism and the Status Quo,"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Iss. 4, 2019; Jeanne L. Wilson, "Are Russia and China Revisionist States?" *The Asia Dialogue*, June 11, 2019,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9/06/11/are-russia-and-china-revisionist-states/>.

⑮ 《外交部长王毅谈如何看挑战丛生的世界》,央视网,2017年2月19日, <https://news.cctv.com/2017/02/19/ARTIbgY13fgg00B4DBjFvbJs170219.shtml>。

⑯ 杨洁篪出席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2月1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17/c_1124124347.htm。

⑰ 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7月26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jz_673089/zyhd_673091/t1895177.shtml。

⑱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